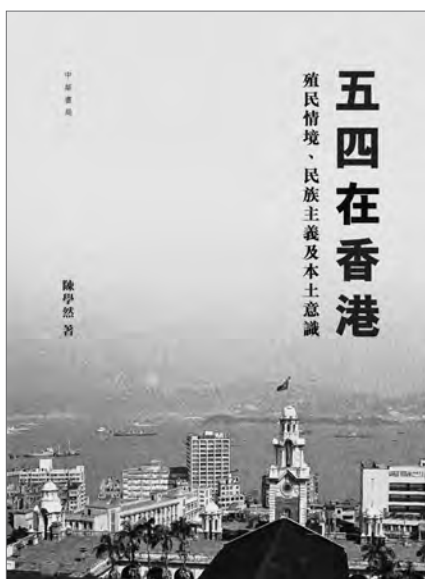


「五四史」的另一種書寫

——評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

● 申博聞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

五四運動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繞不開的一個重要問題，正如周策縱所說，「再沒有任何的主要事件像『五四運動』這樣惹起各種的爭論，

這樣廣泛地被討論」^①；陳平原甚至說：「整個20世紀都是五四新文化的世紀」^②。五四運動爆發至今已百年，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國際學術界，研究成果都頗為豐碩^③。當遇到整數的周年紀念，學術會議和論文集更是「鋪天蓋地」。回顧學術史，不難發現國內五四運動的研究已經涉及到方方面面，內容十分豐富，但論述角度較為單一，多為單一史觀指導下的研究；至於五四運動的在地化研究，成果也相當可觀，但充其量只是一些文史資料彙編或歷史材料^④，至今仍未深入展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陳學然的著作《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以下簡稱《五四在香港》，引用只註頁碼）則為我們（尤其是中國大陸讀者）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解五四運動的視角，同時讓我們對當今香港社會的一些現實問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五四在香港》全書共有六章。在序章部分，作者回顧了「五四」

五四運動的在地化研究，至今仍未深入展開。陳學然的《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解五四運動的視角，同時讓我們對當今香港社會的一些現實問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書在地方史與國家大歷史的框架下闡釋了研究「五四在香港」的必要性及其意義。作者預示了「五四在香港」的複雜性並不會在短期內消除，而香港史書寫中的「殖民情境」、「民族主義」、「本土意識」三種動力依然會繼續存在。

視野中的香港史書寫，透過不同史觀的香港研究展示了「五四精神」在香港的複雜面貌，在地方史與國家大歷史的框架下闡釋了研究「五四在香港」的必要性及其意義。第一章追溯了五四運動的思想脈絡，對相關的一些重要概念做了定義，也對「五四」的複雜面相進行了梳理。在第二章中，作者利用香港政府檔案、1919年前後的報刊新聞等第一手史料，還原了五四運動如何傳入香港以及在港播散的途徑，為下一章補正學界主流觀點提供了史實基礎。

第三章開始轉入本書的核心章節，作者對「五四在香港」的研究進行了反思，同時對當前流行的詮釋話語作出了系統的深入考察，除了糾正目前論述的闕失之外，還分析了「五四在香港」直到1930年代中期都不能興起的各種深層原因。作者反思了香港歷史教科書帶有偏差的歷史知識和特定意識形態對學生認知歷史產生的影響，希望能重塑「五四在香港」的歷史真相。第四章討論「五四在香港」的在地化發展歷程。香港的五四紀念延續至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時代使命。作者用「由國而地」、「由地而國」、「即地即國」三個概念說明了不同時期港人如何處置「地方」與「國家」的關係。終章述及香港與五四運動的未竟理想，是對全書內容的簡要總結，作者預示了「五四在香港」的複雜性並不會在短期內消除，香港史書寫中的「『殖民情境』、『民族主義』、『本土意識』三種動力依然會繼續存在，會繼續因應實際環境的變化而相互流轉」（頁321）。

一 「五四」在香港的「二元化」發展

在我們回顧香港「五四史」之前，很有必要先對五四運動的定義與範圍進行解讀。不同學者對於「五四」有不同的定義，例如周策縱分別從廣義和狹義來界定，認為廣義的「五四」時間跨度由1917到1921年，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反傳統文化、「打倒孔家店」、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以及知識份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而狹義的「五四」就是發生於1919年5月4日的學生運動。鑒於五四運動複雜的思想內容，周氏傾向於採用廣義的「五四」^⑥。余英時認為「五四」的「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兩年以前（民國六年〔1917〕）的文學革命，其下限大抵可以民國十六年〔1927〕的北伐為界」^⑥，將時間跨度延長到十年。林毓生則把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力與五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相互掛鉤^⑦（頁46-47）。

在中國大陸學術界，1949年以後大半個世紀裏普遍認為五四運動是在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發生的一場反帝愛國運動，甚至是由共產黨發起的一場反帝愛國運動，更多強調的是狹義的「五四」。改革開放後，當然也有自由主義者對其進行廣義上的解讀（頁47-48）。作者在綜合幾種觀點之後，將「五四」定義為：作為「事件」的五四運動被看作是政治層面的、狹義的「五四」，「涉及新文學、反傳統及提倡德先生、賽先生的則被看作是文化層面的、廣義的『五四』」。狹義

的『五四』偏重於街頭層面的政治性論述，以街頭上反帝反侵略的救亡救國為行動方案與目標；廣義的『五四』重於文化層面的知識性論述，在思想上表現啟蒙、趨新、求變的反傳統面相，以『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拋進茅廁三十年』為行事的宣揚口號，是一場否定孔子、否定自身傳統文化和要求全盤西化的運動」（頁50）。作者將廣義和狹義上的「五四」進行了概念的融合，在敘述五四運動在香港的發展時，嘗試呈現出一種「二元性」，亦即政治層面的「五四」和思想文化層面的「五四」。

五四運動爆發後，消息很快就傳播到了全國各地，香港當時雖屬英國殖民地，處於「中心的邊緣地帶」（頁87），但依舊受到了影響，然而受影響的程度卻和國內城市不可同日而語。一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香港雖然割離母國而不幸成為英國殖民地，但在國家命途多舛、列強圍堵、賣國賊猖狂的衝擊下，港人在『五四』強大精神感召下，與全體國人憂戚與共」，愛國熱情「與廣州人、上海人、北京人毫無二致」；「而新文化思潮於香港的在地化傳播與內地城市也基本無異，同樣改變了港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與文化觀念」（頁23、24、215）。作者經過細密的考證之後，發現這類說法有一個共同的來源，那就是陳謙關於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⑥。陳謙指出香港的五四運動與國內其他大城市並無二致，香港民眾反帝排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甚至「蜂擁至日人開設的店門前示威，……把商店的櫥窗搗毀」，因此被作為日本盟友的港英政府

極力壓制，日方也因港人的抵抗不斷增強而派軍艦抵港威懾（頁24、153）。

作者在查閱了1919年相關時段的中英文報紙以及英日官方檔案的相關記述之後，發現香港並沒有發生如此激烈的反抗事件。真正走上街頭公開呼應內地「三罷運動」的，只有一度引起社會關注的「持傘遊街案」中九名未成年的「小孩子」，街道上只出現零星的、沒有組織的張貼罷用日貨告示的行動（頁102-34）。而日本軍艦抵港一事，則或是由於陳謙回憶時年齡偏大，記憶出現了偏差。作者指出，政治層面的「五四」在香港產生激烈迴響的觀點也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因為《英日同盟》條約在當時仍然生效，所以港英政府嚴厲防範排日活動，同時也擔心排日活動最後會演變成排英、排外的運動，殃及池魚（頁155-56）。就政治層面而言，五四運動對香港的影響是極為有限的，或者可以說是「不明顯、不能算是持久的」。

如果從思想文化層面考察「五四」在香港的發展，也是同一番景象：思想文化層面的「五四」在香港沒有引起迴響。作者將原因歸納為兩點：第一，身處香港這一邊緣地區的知識精英在思想上要比中心地區的人士更保守、更執著，對新文化表現得更排斥、抗拒，而且民眾的文化層次總體較低，缺乏傳播的土壤；第二，早期香港沒有類似於北京、上海或廣州等大城市裏的現代知識群體，沒有類似於內地城市的學術文化圈，更沒有類似於今天所言之知識界或學界。當時的主流人物是「晚清遺老」，他們沒有

作者敘述五四運動在香港的發展時，嘗試呈現出一種「二元性」，亦即政治層面的「五四」和思想文化層面的「五四」。如果說政治層面的「五四」在香港引發了小小的波瀾，那麼思想文化層面的「五四」則是「清風吹不起半點漣漪」。

受到辛亥革命的衝擊，依舊停留在清末中國的文化氛圍裏(頁169-97)。

綜上所述，如果說政治層面的「五四」在香港引發了小小的波瀾，那麼思想文化層面的「五四」則是「清風吹不起半點漣漪」^⑧。作者通過嚴謹的歷史學研究方法修正了傳統的香港「五四史」書寫，還原了「五四」在香港的本來面貌，這是本書的一大特點。

二 超越「五四在香港」書寫本身

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作者在書中流露出對香港現實問題的深切關懷。作者在第四章回顧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的「五四在香港」的發展歷程，五四運動因各種現實政治需要而開始為不同政治陣營的人所利用，香港的「五四」也因此被貼上了不同的標籤，複雜性由此而生。1939年以前，「五四」在香港的影響依舊很小。1939年是「五四在香港」發展的關鍵年份，此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的關鍵時期，而這一年也是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意義重大。1949年之前，國共兩黨出於救亡圖存或內戰需要，分別朝着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詮釋「五四在香港」，在思想文化領域明爭暗鬥。

自1950年代以來，香港的五四紀念場域基本上呈現由左翼或親共陣營主導的格局。1997年後，「國家化」全面取締「在地化」^⑨，國家試圖建立對陸港相關問題的整體性、結論性的解釋。要達到「整體性」，必然伴隨「排他性」。與此同時，香

港的「五四精神」愈趨政治化，甚至還有「新創」(例如2013年「五四青年節」宣稱「五四精神」為「尊重與包容」)，卻與年青一代愈形疏離；作者指出近年香港社會產生的很多問題都與此有關(頁307-309)。

2013年沸沸揚揚的香港城市大學粵語/普通話授課「罵戰」事件，作者作為親歷者，一直處於風口浪尖，想必深有體會。這些事件也體現港人的國族歸屬感和自我認同出了「偏差」。筆者最近看到一位香港的「千禧世代」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說道：「我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出現了危機，我們的政府告訴我們：『你們不能說自己是「香港人」，因為你們需要在身上貼上「中國人」的標籤。』他們〔政府〕對『中國人』的解釋是非常單一的。」該採訪還指出，80%的年輕人都對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感到不滿^⑩。

蕭鳳霞發出過這樣的擔憂：現在香港社會有一種「內捲化」、「細胞化」的趨勢，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香港呈現出的許多態勢，都表明了這個城市走向「細胞化」的可能——即使不是整個社會的「細胞化」，至少可能是個人思維的「細胞化」。「香港」和「香港人」成為一個自以為能夠自足的單元，心態在一定程度上與外部世界隔絕；這點在中產階級(包括未來的準中產階級——大學本科或更高學歷者)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⑪。殊不知，一個地方的「細胞化」，不僅僅是外部的強大政治力量操控的結果，而且是每個作為能動者的個人，在自以為反抗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使用了抗爭對象的語言和思

「五四在香港」顯示了香港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複雜性與連續性：只要港人依然徘徊於「地方」與「國家」之間而無所適從，那麼「五四在香港」便會一直被強調，陸港關係危機便不會消除。

維方式，結果自己成了受害人而不自知^⑬。作者在書中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認為「五四在香港」實際上也顯示了香港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複雜性與連續性：只要港人依然徘徊於「地方」與「國家」之間而無所適從，那麼「五四在香港」便會一直被強調，陸港關係危機便不會消除。中國大陸對香港近年發生的一些「運動」一直處於不理解、甚至是批判的狀態，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國家化」的推進在香港是否一定有效、成功？

三 不只是「事件史」

除了書寫「五四在香港」的歷史外，本書也是一部香港城市史研究的佳作。城市史的概念很廣，目前學界對城市史也並沒有嚴格或統一的定義。一般而言，城市史的研究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傳統或狹義的城市史研究指有關城市興衰的歷史研究，尤注重研究街區、社區、市政的發展及相關的社會問題；廣義的城市史研究則以城市作為大背景，但其研究的重點不一定與城市發展直接有關。近年來不少被納入城市史的著作主要以一個城市作為個案，研究某個超越該城市本身的專題，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以上海為個案研究中國工人運動，上海只是一個與主角有密切關係的舞台、背景，主角是工人和工人運動，並探討其在中國近現代史中的作用^⑭。如盧漢超所說：「這樣的書既是工人史，也是城市史。」^⑮同樣地，本書以香港為背

景或舞台，但更注重探討的是五四運動在香港這一特定城市的在地化發展，其實已經超越了狹義的城市史研究，是一種廣義的城市史研究。正如作者所言：「本書既研究『香港史』，同時又研究『五四』發展史，重點固然在於探究『五四』如何在香港發展的前經後過，以及釐清當中因民族主義引發的各種複雜問題；但在探討『五四』於香港在地化過程中，所反映和折射的問題及其意義也饒有研究興味。」(頁25)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除了使用歷史學的方法對史實進行考證之外，同時也應用了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某個城市或區域的研究是一種在地化的研究，需要獲取的更多是「地方性知識」，這種地方性知識的獲取一方面需要研究者對已有的地方性文獻進行解讀，另一方面也需要他們步入「歷史現場」，深入社會、走向大眾，去體驗、觀察和調查。本書既然研究「五四」在香港的迴響，那麼就十分有必要了解民眾尤其是青年人心中的五四運動；使用調查問卷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學研究方法，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本書的附錄四是作者使用的調查問卷，調查時間為1999到2012年，調查機構為香港的不同團體，同時也有作者自己進行的調查(頁389-410)^⑯。通過這些問卷調查，我們可以發現「從回歸以來五四紀念活動從不間斷，但香港青年對五四運動的認識始終未有大幅提升」(頁387)，這也與作者在本書第三章中對香港歷史教科書編寫的反省形成了呼應。

本書以香港為背景或舞台，但更注重探討的是五四運動在香港這一特定城市的在地化發展，其實已經超越了狹義的城市史研究，是一種廣義的城市史研究。

四 餘論：一部香港史 該如何書寫？

從曾經的「香港村」、「香港島」到今天的國際大都會，從曾經的大英帝國殖民地到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恐怕世界上很難再找到一個有如此「傳奇」經歷的城市。正如陳國球在《香港的抒情史》一書的序言中所說：「要『理解』香港，不能單憑『香港人勤奮工作，應變靈活，悉心戮力發展經濟，成為國際商貿中心』，這幾句官方門面話；或者『香港，是一個畸形兒——富麗的物質生活掩蓋着貧瘠的精神生活』，那種居高臨下的譏諷與嘲笑。」^①

尤其自近代以來，香港的歷史發展是複雜的，無數的香港歷史片段該如何書寫，是每個香港研究者都要面對的問題。有人說香港是一本「難唸的書」，而香港的歷史更是一本「難寫的書」。本書所研究的不僅是「五四史」，更是「香港史」，作者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書寫香港史的新視角，那就是既不能完全否定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聯繫，「去中國化」、「去歷史化」，過份誇大香港的獨特性，甚至「合理化了百年殖民主義的統治史」（頁22）；也不能完全將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差異性抹去，用「愛國」和「民族文化」的旗號將其視為「趨向於統一的辯證的國家地方關係」^②。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如因維持香港獨特性因素而出現排斥中國史的香港史書寫，是不能構成真正的香港史的；但是，向大國史觀過度靠攏的香港史書寫，令「五四在香港」的在地化發展難以區別於國內大

城市的五四書寫，其實也會忽略掉擁有百年殖民地經驗的香港迥異於國內大城市的城市個性，最終抹殺其獨特性（頁22）。不論是過於強調本土而排拒大國史，還是為求迎合政治需要而過於傾向大國史，均會使香港歷史或城市經驗的書寫流於籠統和失實，無助於釐清香港的身份特性。要之，沒有香港史的中國史固然不完整，但沒有中國史的香港史更是殘缺和片面（頁214）。在沒能找到平衡之前，也許書寫香港史最好的選擇就是回到歷史書寫本身。

註釋

①⑤ 周策縱：〈英文初版自序〉，載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長沙：嶽麓書社，1999），頁5；6。

② 陳平原訪談：〈整個20世紀都是五四新文化的世紀〉（2017年5月3日），《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眾號。

③ 比較重要的著作有丁守和、殷筱彝：《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北京：三聯書店，1963）；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等。研究論文參見徐勝萍：〈海外與港台「五四」運動史研究綜述〉，《東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頁22-29；朱志敏：〈八十餘年來國內五四運動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2期，頁37-46；趙入坤：〈五四運動90周年學術綜述〉，《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頁11-23；張忠：〈學商政的博弈與地方五四運動——以1919-1920年的河南為視角〉，《史學月刊》，2015年第8期，頁25-31等。

不論是過於強調本土而排拒大國史，還是為求迎合政治需要而過於傾向大國史，均會使香港歷史或城市經驗的書寫流於籠統和失實，無助於釐清香港的身份特性。沒有香港史的中國史固然不完整，但沒有中國史的香港史更是殘缺和片面。

④ 例如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主編：《五四運動在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王思賢：〈山西學生「五·四」運動二三事〉，載《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五輯（太原：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頁320。

⑤ 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載《五四研究論文集》，頁113。

⑥ 林毓生：〈緒論〉，載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2-6。

⑦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頁40-45。

⑧ 聞一多：〈死水〉，載孫黨伯編：《聞一多全集》，第一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頁146。

⑨ 其實不只是歷史學，文學也在被「國家化」收編。詳見陳國球：〈收編香港：中國文學史裏的香港文學〉，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編：《都市塵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3-21；鄭政恆：〈以「抒情」抗衡「忘情」：香港人的香港抒情史〉，《明報》，2016年12月18日。

⑩ “Why Are Hong Kong’s Millennials so Unhappy?” (29 April 2017), BBC News, www.bbc.com/news/av/world-asia-china-39690315/why-are-hong-kong-s-millennials-so-unhappy.

⑪ 「內捲化」是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1960年代用於描述印尼爪哇勞動密集型水稻耕作農業模式的一個概念。所謂「內捲化」，是指某種經濟、社會或文

化模式持續發展一段時間並導致某種決定性的狀態時，無法自行轉型到一種新的模式，以推動進一步的發展。「細胞化」是蕭鳳霞借用生物學「細胞」的概念，把「國家內捲」的意象由外在的社會推行到個人的身心。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由外而內、徹徹底底的「內捲」，並非單方面來自外在的國家機器強力施壓的結果，而是每個個人共同參與，最終被國家的語言內化身心，自我收縮成一個最基本的單元，既與外界絕緣，也不能離開「國家」這個身體而獨立存在，讓自己也「成為國家」的共謀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權力的運作從外而內、由硬而軟，個人被權力操控，也共同行使着權力。詳見程美寶：〈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6年12月號，頁130-31。

⑫ 程美寶：〈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頁138。

⑬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⑭ 盧漢超：〈美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頁116。

⑮ 這些團體和調查年份分別是：1999年，香港青年協會；1999年，民主黨青年事務委員會；2007年，民主黨國是小組；2010年，城市智庫；2012年，青年民建聯。另見作者在2010年對三千名香港中四至中七學生進行的大型問卷調查《香港中學生的五四運動及「香港五四青年節」認知》。

⑯ 陳國球：〈自序〉，載《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1。

⑰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317。